

魯迅與胡風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在魯迅的一生中，對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產生重要的貢獻及影響的，是他居住在上海的十年（1927-1936），也就是所謂的「左聯」十年。不過，一般的評論家都把「左聯」分成前後兩期，以1933年底為分界線¹。在「左聯」前期裏，與魯迅最為接近的左翼人士是馮雪峰。不過，馮雪峰在1933年底離開了上海到蘇區瑞金去²（這正是「左聯」以1933年底來劃分前後兩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左聯」後期裏，與魯迅最投契的是胡風。可是，就是在「左聯」最後的三年歷史裏，魯迅與中共在上海文藝界的領導人產生了嚴重的矛盾，關係變得十分惡劣，最後更公開決裂；魯迅在給徐懋庸的一封信裏點名痛罵了周揚、夏衍等共產黨員³，左翼文藝界出現了兩個壁壘分明的陣營。

在魯迅與左翼文藝運動的問題上，胡風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長久以來，中國大陸的出版物，都說胡風在三十年代破壞了魯迅與中共文藝界領導人的良好關係，蒙騙了魯迅，並煽動他向周揚等進行攻擊。這論點自然有助於減低一直以來領導中共文化界的周揚在魯迅與左翼作家決裂的問題上應負的責任。不過，就是在「文革」以後，這種論點仍然繼續出現。任白戈在一篇回憶「左聯」的文章裏說：胡風「常常在傳達魯迅先生指示的時候帶進一些他自己的意見，有些就顯然與周揚同志的意見不同。」⁴就是茅盾也說過胡風「製造混亂，分裂當時左翼與進步文藝界」，又說魯迅為胡風所利用⁵。

1 參 W. C. Wong, "The Left League Decade: Left-wing literary movement in Shanghai, 1927-1936"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6), p. 164.

2 馮雪峰《回憶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7月，頁118；包子衍《雪峰年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7月，頁68。

3 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六，頁526-538。

4 任白戈《我在「左聯」工作的時候》，《左聯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3月，頁372。

5 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實》，《新文學史料》，第二輯，1979年2月，頁245。

另一方面，右派的評論家也同樣的重視胡風在這個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他們認為魯迅和胡風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後反對周揚等人，是一次「反控制鬥爭」，是在合作「拆」左翼文藝界的「壇」⁶。這樣，便能夠有效地打破他們所謂由中共刻意營造出來的「魯迅神話」。

由此可見，胡風在魯迅研究，以至整個三十年代左翼文藝研究中，都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過，上引的兩個觀點是不是能夠真正反映出魯迅與胡風，以及他們二人跟那些黨員作家和黨領導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對於魯迅與部分「左聯」領導人的交惡，以及左翼文壇的分裂，胡風究竟應該負上甚麼的責任？這都會是本文集中討論的焦點。

過去，由於胡風曾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拘禁達二十五年之久，至1979年1月才獲釋⁷，因此，我們一直沒有機會聽到胡風自己的辯白，所以，處理這個問題時遇到的困難特別大；加上從前人們對胡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五十年代他受到中共黨中央所發動的清算上面⁸，詳細討論胡風在三十年代的活動及他跟魯迅關係的論文不算很多。不過，胡風在1980年9月正式獲得平反以後，開始寫了不少回憶文字；另外，一些有關的當事人也比較願意多談這個問題，給研究者帶來很多方便。

二

胡風，湖北蕪春人，本名張光人，1902年生。本來是屬於一個富有的世家，但到了曾祖父的一代已經衰落，父母親都是做豆腐的手工小販。在胡風兩個哥哥成年後，他們的家境已大為改善。胡風十一歲才上學，1920年到武昌進啓黃中學，開始大量閱讀新文學作品⁹。在一篇回憶他早期生活的文章裏，胡風說他最初接觸的新文學作家是胡適、郭沫若、王統照、冰心及「湖畔詩人」。結果，他最初的創作就是一些「《春水》式的詩」¹⁰。後來，他才在《晨報副刊》上讀到魯迅的《〈吶喊〉自序》。據說他當時沒有看懂，但卻買了《吶喊》回來，也不怎樣的讀得懂；可是，他卻深受感動，「本能地感到了他所寫的正是包圍著我自己的黑暗和痛苦。」跟著，

6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1-99；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7月。

7 1954年7月，胡風向中共黨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的報告》，批評及攻擊中共自1949年以來的文藝政策及領導問題，結果被打成「反革命」，被捕下獄，1979年1月才獲釋，1980年9月獲得平反。參《胡風追悼會悼詞》，《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2期，1986年5月，頁211；梅志《往事如煙——胡風沉冤錄》，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4月。

8 參 Merle Goldman, "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 *China Quarterly*, No. 12 (Oct-Dec 1962), pp. 102-137; 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29-157; Yang I-fan, *The case of Hu Feng*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ion, 1956).

9 胡風《我的自傳》，《胡風晚年作品選》，廣西：漓江出版社，1987年1月，頁214。

10 胡風《理想主義者時代底回憶——為〈文學〉周年增刊〈我與文學〉作》，《胡風評論集》（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3月，頁251。

他更買了四、五本《吶喊》來分贈摯友。胡風說：自此魯迅成了他「最親愛的名字」¹¹。這可以說是胡風後來對魯迅崇拜的基礎。

1923年，胡風進了南京東南大學附中唸書，選修了「新文藝班」¹²；同時又越來越關心社會的境況，積極參加學生及政治運動。「五卅運動」（1925年）期間，他「奔走在街頭和工廠中間」，更在恽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上面撰文鼓吹革命，並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¹³。

1925年12月17日，胡風在北京大學建校二十七周年紀念會上見到魯迅¹⁴。那時候，他們二人都在北京大學：胡風在1925年7月考入北大預科，而魯迅則在北大任教。

1926年1月17日，魯迅的日記上記有：「上午得張光人信」¹⁵。這封信從前是沒有公開過的，不少評論家都只是想當然的說胡風「出於對魯迅的尊敬」，慕名寫信給魯迅請教¹⁶。但在1982年底出版的一期《魯迅研究資料》裏，便把整封信刊出來¹⁷。我們見到這封信對魯迅其實並不是怎樣尊敬的。原來胡風寫這封信的目的，是因為讀了魯迅所譯的《苦悶的象徵》後，發現了一些翻譯上的問題，所以才寫信給魯迅。此外，這封信的措詞也不很客氣，一開始便說譯文「似乎對原文的構造有點誤解」，在討論的部分裏，又說譯文與原文「相差太遠」¹⁸，完全不像是出於「尊敬」而寫成的。事實上，魯迅並沒有給胡風回信。

在這一年的夏天，胡風和魯迅都離開了北大。胡風是因為在北大時，「理想主義的追求得不到滿足」¹⁹，所以轉考進了清華大學英文系；魯迅則在七月離開北京南下，九月到廈門大學任教。就是這樣，胡風和魯迅再沒有進一步接觸的機會，直到七年後的1933年，他們才在上海正式見面，建立起鞏固的友誼。

胡風在清華大學只讀了幾個月便又退學，回到湖北故鄉參加革命。由於那時候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期，胡風曾參加過蕪湖縣國民黨黨部工作。1927年4月，國民黨清黨，胡風從鄉間逃出來。根據一些在大陸出版的材料，胡風這個時期「在江西『剿兵』軍中做過反共的政治工作」²⁰。

1929年9月，胡風與同學朱企霞一起到日本東京去，先在神田區東亞日語學校學日語，開始接觸了日本左翼文化運動，認識了一些重要的日共成員，包括出版日本普羅作家同盟

11 胡風《在混亂裏面》，重慶：作家書屋，1945年，頁80。

12 徐大悲《胡風與魯迅》，《中聲晚報》，1955年6月13日，轉引自翟志成《胡風與胡風集團重要成員歷略》，《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116。

13 《文藝報》，1955年11月號，頁4。

14 馬蹄疾《魯迅和胡風》，《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下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7月，頁336。

15 《魯迅全集》，卷十四，頁585。

16 《魯迅和胡風》，頁336。

17 《張光人致魯迅（1926年1月16日）》，《魯迅研究資料》，第十輯，1982年10月，頁14-15。

18 同上注。

19 胡風《我的小傳》，頁214。

20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人民日報》，1955年6月10日。

刊物《普羅文學》的大竹博吉、日本普羅作家同盟委員長江口渙，以及小林多喜二等²¹。1931年春，胡風取得慶應大學的學籍，並曾回中國逗留了一段時間，夏末才返東京。在慶應大學唸書時，胡風加入了普羅文化聯盟下的普羅科學研究社的藝術學研究會，每週開會一次。胡風還曾在該會出版的《藝術學研究》(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反戰文學的文章²²。跟著，他和方翰、王承志等人參加了日本反戰同盟，成立了一個中國人小組，同時也是日共《赤旗報》的讀者小組，後來便接獲日共領導的通知，整個小組獲批准成為日共產黨員小組。就是這樣，胡風便加入了日本共產黨²³。

1932年底，胡風再次回到上海²⁴，那是出於日本反戰同盟的意思。該同盟發起召開一個遠東反戰會議，要求他們的中國人小組派人回中國，邀請代表出席。不過，胡風這次回國，只是逗留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便帶著代表「中國」參加反戰會議的樓適夷一起回東京。這次會議沒有馬上開成，原因是出席的代表只有樓適夷一人，結果只算是一次籌備會議²⁵。

1933年底，胡風被日本警察拘捕，經過了嚴厲的拷打審問，以及坐了三個月牢後，胡風在七月初被遣返國，正式開始了與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關係。

三

其實，就是胡風在日本期間，也與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有過一些接觸。

1931年夏天，胡風剛取得慶應大學的學籍後，曾經回到中國一行。在歸途路過南京的時候，他曾住在韓起的家裏²⁶。韓起和他的妻子董曼尼都是上海「左聯」的成員。事實上，從胡風的回憶看，在胡風留日期間，韓起是充當了胡風與中國左翼文藝界聯絡的橋樑。例如胡風就是透過韓起與當時負責「文總」領導工作的馮雪峰通信的；而上文提過1932年底胡風回中國之行，除了是爲了籌備遠東反戰會議外，更是因爲接到韓起的來信，說「文總」要他回到上海參加組織部工作²⁷。除了韓起外，胡風這次回國也見過張天翼，談得很投契，而張天翼也就是差不多在這時候加入上海「左聯」的²⁸。

21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一)，《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1期，1984年2月，頁30-32。

22 同上注，頁34。

23 同上注。

24 同上注，頁35；胡風《關於「左聯」與魯迅關係的若干回憶》，《魯迅研究資料》，第九輯，1982年1月，頁177。

25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一)，頁35-36。

26 同上注，頁33。

27 同上注，頁35。

28 上海師範學院圖書館資料組《左聯盟員談「左聯」》，《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五輯，1980年12月，頁138。

在加入日本共產黨後，胡風還通過駱劍冰向謝冰瑩或任鈞的介紹，加入了「左聯」的東京分盟²⁹，還開過一次小組會議，出席的有謝冰瑩、胡風和一個姓阮的盟員³⁰。此外，他還和其他「左聯」東京支盟的成員像華蒂（以羣）等接觸；更重要的是，胡風參加組織的「新興文化研究會」所出版的油印刊物《新興文化》，被一些留日學生視為中國「文總」東京支部的出版物，因而產生矛盾，互相攻擊³¹。最後，胡風透過韓起向上海報告，後來更收到韓起的回信，說「文總」承認他們的工作³²。這點很重要，充分反映了胡風在日本的時候已經跟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有密切關係，而且得到認同為該運動的一分子。

1932年底那次回國，讓胡風有更多機會接觸在上海左翼文藝界的領導人物。上文說過，胡風在這次回國前，曾經接到韓起的來信，說上海「文總」希望他回國參加組織部工作。換言之，上海左翼文藝界在這時候已經有意招攬胡風進入領導階層內。

據胡風的回憶，他這次回到上海後不久，便跟馮雪峰見了面，並留下很好的印象。他說：

第一次見面就好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談話非常親切，沒有一點領導者的官氣，贏得了我的信任。³³

此外，他還由以羣領去參加了一次「左聯」的日常性會議，跟書記丁玲也是一見如故。他也跟周揚見過面，據說「也像是熟人一樣」；另一個跟他見過面的左翼人士是穆木天。那時候，穆木天也是對他「出奇地友好」³⁴。工作方面，他向馮雪峰說清楚自己沒有條件做「文總」組織的工作；於是馮雪峰改變主意，要他擔任「左聯」的宣傳部長，並擬定了由魯迅在宣傳部下面主持一個研究會。但胡風也把這個建議推掉了³⁵。

假如胡風這段回憶文字是真確的話，便反映出胡風在這個時候很受上海左翼文藝界的歡迎，甚至在當時已經有矛盾的馮雪峰和周揚，也同樣的對他表示友好，就好像要拉攏他一樣。為甚麼會這樣？這只能從胡風的經歷作一點推測。也許是因為胡風是日共黨員，且與日本一些左翼文藝界的領導人有良好的關係，所以受到上海左翼人士的重視。

不過，這次上海之行，卻是胡風牽涉入左翼文藝界的矛盾及風波裏面的開始。上文說過，幾乎所有在上海比較重要的左翼人士大都跟他很要好。可是，這班人中間其實在當時已經起了矛盾，而這情況胡風是完全了解的。首先是在「第三種人」論爭的問題上，馮雪峰和周

29 上海師範學院圖書館資料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盟員考錄》，同上注，頁74。

30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一），頁34。

31 同上注，頁35。

32 同上注。

33 同上注。

34 同上注，頁35-36。

35 同上注，頁36。

揚鬧意見³⁶。二人都曾經向胡風談過這問題，並為自己辯解。胡風在幾十年後所寫的回憶錄裏說：

我在政治原則上覺得馮[雪峰]對，但在文藝看法上卻偏向於周揚的過左傾向。³⁷

究竟這是甚麼意思？似乎不容易理解。原因是馮雪峰在這次論爭中的政治傾向，其實是採取一種比較開放的政策，願意把一些「同路人」也吸納到左翼陣營來。相對來說，周揚那種要求堅持文學有絕對的階級性的傾向，的確可以算是左傾了。換言之，馮雪峰跟周揚的立場是有很大的分歧的，這也就是他們發生爭吵的原因。由此看來，上引胡風所說他當時所採取的立場，似乎很難成立，根本沒有可能既覺得馮雪峰對，同時又贊同周揚的傾向。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胡風當時其實與周揚較為接近，這點從他為周揚所主編的《文學月報》上所寫的《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一文可以證實。在這篇文章裏面，他批評了《現代》雜誌上的一些作品，打擊「第三種人」的論點³⁸，可說是完全支持了周揚的「過左傾向」。至於他說在政治原則上支持馮雪峰，很可能是由於他後來與周揚交惡，跟馮雪峰及魯迅接近，因此也就有這樣的說法。但另一方面，由於他確曾公開發表過《粉飾、歪曲、鐵一般的事實》，所以不能不承認當時支持周揚的立場。結果，他的回憶錄便出現了上述的矛盾。

此外，胡風當時聽到的還有穆木天對魯迅及馮雪峰的攻擊，起因是魯迅的《〈三閑集〉序言》。這篇寫於1932年4月的文章，裏面總結了1928至1929年間魯迅與革命文學派的論爭，其中對於創造社帶有諷刺的意味³⁹。據胡風說，曾經是創造社成員的穆木天，對這篇文章很不滿意，更在他面前大肆攻擊馮雪峰，「說他不該讓魯迅發表這篇文章」⁴⁰。經過這次上海之行，胡風得出的結論是：

魯迅和創造社在思想上的對立有很深的根源和社會基礎，那明顯地反映在馮雪峰和周揚、穆木天的對立上面。⁴¹

胡風在解釋自己為甚麼不接受馮雪峰的邀請，擔任「左聯」的宣傳部長時說，那是因為他見到上述的那些矛盾和紛爭，覺得自己的資歷及能力有限，不足以擔當領導的工作⁴²。

36 參馮夏熊《馮雪峰談左聯》，《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1980年2月，頁10。

37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一），頁35。

38 《文學月報》，第五、六號合刊，收《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東京：大安株式會社，1968年，卷二，頁373-383。

39 《〈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卷四，頁3-6。

40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一），頁36。

41 同上注。

42 同上注。

因此，胡風這次拒絕馮雪峰留在上海參加「文總」工作的建議，實際上是為了逃避上海左翼文藝界的矛盾，以免陷進宗派的糾紛裏。可是，相距只有半年多的時間，胡風便需要直接面對這個問題。他被日本警察驅逐回國後，馬上便參加了左翼文藝界的陣營，而且很快的便登上了相當高的領導位置。

四

胡風在1933年7月被逐回國的時候，似乎曾經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原因是這次被逐回國的有幾十人，裏面除了有左翼文化人士和共產黨員外，還有一些國民黨員。他們被日本拘捕及驅逐回國，在當時被看成是反日的愛國英雄行爲，所以得到上海各界的熱烈歡迎。到上海外灘輪船碼頭歡迎的人很多，被逐回國的人甚至舉行記者招待會，上海不少報章均有記載⁴³。此外，胡風那時候在上海的文藝界已有一些名氣，負責到碼頭去歡迎這批回國人士的吳奚如，也說過他「主要是爲了迎接東京「左聯」分盟的負責人之一的文藝理論家谷川[胡風]」。吳奚如在早些時候已經讀過胡風的文藝理論文章及翻譯的文學作品⁴⁴。

儘管後來人們說胡風與周揚對立，破壞左翼文藝陣營的團結，但必須強調的是：在胡風回國之初，他與周揚是很接近的。胡風回國後不久，周揚曾經親自去看他。在他回國後還未滿一個月，周揚便委派他擔任「左聯」的宣傳部長一職；跟著，茅盾在十月辭去了「左聯」書記的職位後，周揚也找胡風來擔任這個重要的位置⁴⁵。在這段期間裏，胡風和周揚可以說是緊密合作的，胡風當「左聯」宣傳部長時，周揚是「左聯」的組織部長及黨團書記；胡風當「左聯」書記時，周揚則任宣傳部長以及主理黨團的工作。他們時常一起在胡風的家開會，而胡風也知道周揚的住址，也不止一次去過他家⁴⁶。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爲在當時來說，保密的工作很重要，盟員的住址是不輕易告訴別人的，由此可以證明周揚和胡風在當時是友好和互相信任的。

此外，根據胡風的回憶錄，他和魯迅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他剛從日本回來不久，而且更是由周揚陪同魯迅親自到胡風所暫時寄住的韓起的家來。這次不是甚麼正式的會議，他們只是隨便的談了一些文壇上的問題⁴⁷。不過，周揚這樣做，正好進一步的說明了在胡風初回到中國的時候，他們之間完全沒有甚麼介蒂。

43 吳奚如《我所認識的胡風》，《魯迅研究資料》，第九輯，頁235-236；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1。

44 吳奚如《我所認識的胡風》，頁236。

45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2。

46 同上注，頁47。

47 同上注，頁41。

既然這樣，究竟胡風與周揚是甚麼時候開始不和的？而胡風和魯迅又是在甚麼時候開始接近的？解答這兩個問題，對於我們探究胡風在魯迅與周揚等分裂的問題上所要負的責任，有很大的幫助。

據任白戈在一篇回憶「左聯」的文章裏說，從1934年初開始，「胡風經常表示不同意周揚同志的意見。」⁴⁸任白戈那時候與胡風一起同是「左聯」常委會成員，二人經常與周揚（以「文總」代表身分出席）開會，所以他的話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此外，在同一篇文章裏，任白戈又說過胡風在那時候給魯迅傳達意見時，經常加入了與周揚不同的意見。那麼，我們是否能夠說從1934年初，胡風與魯迅已十分接近？

從前，不少論者從魯迅日記裏找尋一些證據來說明魯迅與胡風交往的密切程度。在魯迅的日記裏，除記錄了1926年1月17日胡風就翻譯的問題寫過信給他外，第一次出現胡風的名字（或筆名）的，是在1934年1月18日，胡風寫了一封信給魯迅，而在魯迅日記裏紀錄了二人第一次的見面，是在1934年2月13日⁴⁹。（胡風回憶所說在回國後不久曾與魯迅見面的一次，並沒有紀錄在魯迅的日記內。）據統計，在隨後兩年半左右的日子裏面，魯迅日記上紀錄了他們二人的接觸共一百二十一次，其中胡風給魯迅信有五十二封，魯迅給胡風信二十三封，胡風訪魯迅三十九次（其中全家往訪三次），魯迅訪胡風有兩次（其中全家往訪一次），聚宴有三次（其中一次胡風沒有赴宴），胡風陪魯迅同訪一次，魯迅邀胡風看電影一次⁵⁰。應該說，這些數字是不完全的，我們相信，二人有一些接觸——特別是見面方面——沒有紀錄在魯迅的日記上。

在魯迅的日記裏，有一處地方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而且也經常為人所提及。那就是1934年12月中，魯迅親往梁園豫菜館訂菜，宴請胡風。魯迅在日記上寫道：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寄谷非[胡風]夫婦、紺弩夫婦、蕭軍夫婦及阿芷[葉紫]信，……

十八日……往梁園豫菜館訂菜……

十九日……晚在梁園邀茗飯，谷非夫婦未至，到者蕭軍夫婦、耳耶夫婦、阿紫、仲方及廣平、海嬰。⁵¹

根據其中一位與會者蕭軍的回憶，那次宴會是魯迅為胡風的兒子做滿月的⁵²。胡風後來解

48 《左聯回憶錄》，頁372。

49 《魯迅全集》，卷十五，頁134。

50 周正章《〈魯迅日記〉中的胡風》，《魯迅研究資料》，第十二輯，1983年5月，頁336-337。

51 《魯迅全集》，卷十五，頁186-187。

52 蕭軍《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頁109。

釋說，那次沒有出席宴會的原因，是由於他一直是利用妻子梅志的娘家轉信的，梅志姊姊那次沒有及時把信轉給他，所以沒有赴會⁵³。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見到，魯迅在這個時候跟胡風已經是很要好的。除了主動發起這次宴會（事前沒有跟胡風商量）外，還親自往菜館訂菜，這在魯迅來說是不很多的。此外，他還向蕭軍夫婦說過：當天晚上宴請的，「都可以隨便談天的」⁵⁴，所以，我們可以相當肯定的說：在1934年底，魯迅與胡風的交情已很深，不可能只是普通的朋友，或者甚至只有公事上的交往而已。

可是，這並不就等於說1934年底是二人交往的開始，那麼，究竟他們是在甚麼時候開始熟稔起來的？

我們可以先從馮雪峰方面入手。

我們知道，在「左聯」前期，馮雪峰是魯迅最信任和接近的共產黨員，對魯迅有很大的影響力。上面說過，胡風在1933年底從日本回上海一行時，曾經與馮雪峰見面，留下很好的印象，馮雪峰更要求他加入「文總」，參加組織部工作。換言之，馮雪峰對胡風是十分器重的。

胡風自日本被逐回國後最初的日子裏，似乎與周揚比較接近，他在「左聯」裏的幾個職位，都是周揚安排的；他更時常與周揚一起開會。但這時候的馮雪峰，卻已經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不再管「左聯」方面的事，所以胡風在「左聯」的工作都避免與他商量⁵⁵。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們完全沒有往來，從胡風的幾篇回憶文字看來，他們很快在工作上也有聯繫，而且還建立起良好的友誼來。

根據現在可以見到的資料，胡風與馮雪峰第一次在公事上的合作，是協助策劃由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在上海舉辦的遠東反戰會議。上文說過，這次會議原是在日本舉行的。那時候，胡風還在日本，由日本反戰同盟委派回國組織代表出席。但這次會議沒有馬上開成，在東京那一次只算是預備會議⁵⁶。1933年中，胡風回到中國後不久，反戰會議才在上海秘密召開。胡風說，這次會議的許多工作，是由馮雪峰主持的。也許是因為胡風曾參加過預備會議的工作，所以馮雪峰也約了他來籌備這次在上海召開的大會。我們相信，就是在這一次合作裏，他們建立起友誼來。據胡風說，在工作之餘，他們「海闊天空地隨便談了起來」，馮雪峰甚至談到他祖父以及他在杭州讀書的情況⁵⁷。我們知道，這次遠東反戰會議正式召開的日期是1933年8月30日。籌備工作最遲也應該在七、八月間進行。可是，胡風是在1933年7月上旬才被逐回國的。換言之，他回國後便差不多馬上與馮雪峰有了緊密的工作關係，更從而開始建立起友誼來。

53 胡風《魯迅書信注釋——涉及我和與我有關的情況》，《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1981年8月，頁80。

54 魯迅1934年12月17日給蕭軍蕭紅信，《魯迅全集》，卷十二，頁605。

55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3。

56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一），頁36。

57 胡風《深切的懷念》，《胡風晚年作品選》，頁183。

此外，胡風在一篇悼念馮雪峰的文章裏說，在馮雪峰離開上海到江西蘇區去前的個多月，「只要有空」，馮雪峰就會去找胡風談談⁵⁸。而在另一篇文章裏，胡風說得更清楚：馮雪峰幾乎每隔一兩天晚上就來找他⁵⁹。在臨行前的一天，馮雪峰還約了胡風到他住的旅館見面，一直談到深夜才離開⁶⁰。這更證明了二人有深厚的交情；在離開上海前，馮雪峰最希望能見面長談的就是胡風。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胡風跟馮雪峰是在1933年底前已成爲好朋友，原因是馮雪峰是在1933年12月離開上海到瑞金去的⁶¹。

既然馮雪峰跟胡風很快便成爲好朋友，同時他又是與魯迅最爲接近，那麼，是不是有可能由於他的關係魯迅與胡風才能夠建立良好的友誼？假如真的是這樣——事實上，當時與魯迅十分接近的茅盾便曾肯定這說法⁶²——魯迅與胡風的友誼，最遲是在1933年底便開始了。

我們還可以看到魯迅日記上紀錄了魯迅與胡風的第一次見面。

上文說過，胡風剛回上海不久，便由周揚帶去見魯迅；不過，這次見面並沒有紀錄在魯迅的日記上。魯迅日記上第一次紀錄二人的見面，是在1934年2月13日。那天的日記上寫着：

下午同亞丹、方璧、古斐往ABC吃茶店飲紅茶。⁶³

亞丹是曹靖華的代號，方璧即茅盾，而古斐就是胡風。據一些文章及書籍說，這次ABC茶店聚會，並不是一般性的「飲紅茶」，而是「左聯」的一次秘密會議，與會的四人都都是「左聯」盟員⁶⁴。不過，這說法是有漏洞的，最重要的是這四人在「左聯」的組織關係上並不密切，不可能有走在一起開秘密會議的必要。茅盾當時已經辭去了「左聯」書記的職務，只具有普通盟員的身分；曹靖華更不是上海「左聯」盟員，他只是參加了北平的「左聯」分盟。在「左聯」的歷史裏面，很少有這樣不同分盟開秘密小組會議的情況。而且，曹靖華自己也說過，他是在1933年秋從蘇聯回北平任教後，專程利用空暇來上海探望魯迅的；他還在魯迅家住了一個星期，在這次ABC吃茶店見面的第二天，便乘船返北平⁶⁵。由此可見，這次會面並不是「左聯」的一次秘密會議，而是朋友間的一次碰頭，其中甚至可以證明魯迅和胡風在這個時候已經有了相當的交情。

58 同上注。

59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6。

60 胡風《深切的懷念》，頁182-183。

61 包子衍《雪峰年譜》，頁68。

62 茅盾說：「我以為造成魯迅如此信任胡風，馮雪峰實在起了很大作用。」(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實》，頁245。)

63 《魯迅全集》，卷十五，頁134。

64 鮑昌、邱文治《魯迅年譜》，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頁327-328；周正章《魯迅日記》中的胡風》，頁337。

65 曹靖華《別夢依依懷雁冰》，《光明日報》，1981年4月1日。

此外，在胡風的回憶文字中，還有一、兩條很重要的線索，但是卻一直沒有得到重視。

第一，據胡風的回憶，他是在1933年12月與梅志結婚的，結婚後一個月，梅志便懷孕了。他們決定把胎兒打掉，先用打聽回來的單方，但沒有成功；然後經魯迅介紹到日本人開的醫院動手術，最後也沒有成功⁶⁶。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胡風找魯迅幫忙的問題。假如魯迅和胡風只見過一次面，完全沒有甚麼交誼，那麼，胡風有沒有可能會找魯迅幫忙，找醫生去動手術為妻子墮胎？這看來不合情理。

第二條值得重視的資料，是關於魯迅在1934年初發表的《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根據胡風的回憶，「左聯」裏有一些人對於魯迅公開發表文章批判楊邨人很感不滿，其中在1934年夏間，中共文委指派林伯修（杜國庠）負責和胡風聯繫。林伯修對胡風提及這封信，對魯迅很是不滿，原因是這樣會不利於對楊邨人進行團結工作⁶⁷。本文不打算討論整件事的前因後果以及孰是孰非的問題⁶⁸，但胡風的回憶錄裏有兩句話是很重要的：

對我這樣提[提出對魯迅批判楊邨人的文章的不滿]，等於批評我不該讓魯迅發表這封信，和當年穆木天攻擊馮雪峰不該讓魯迅發表《三閑集》的序一樣。⁶⁹

從這兩句話，我們可以看到人們認為胡風是對魯迅有影響力的一個人，足以左右魯迅發表某一篇文章。此外，胡風所打的比喻——就好像穆木天責怪馮雪峰一樣，也顯示（至少是在胡風自己心目中）他代替了馮雪峰的位置。由此可見，在1934年的上半年，胡風跟魯迅的關係已經是非常密切的了。

五

既然肯定了胡風和魯迅在1934年初已開始建立了不錯的友誼，餘下來的就是要探討一下究竟胡風在魯迅與周揚（或是「左聯」的黨領導層）之間的矛盾與糾紛，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從而證實一下幾十年來中共對胡風的指控是否公平。不過，首先要討論的應該是魯迅與周揚之間的問題，但由於這不是本文的重點所在，因此也只能作簡單的處理。

上文說過，在1933年中，胡風剛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周揚與魯迅是關係良好的。這點除了屬於周揚派的任白戈和魏猛克等說過外⁷⁰，就是與胡風很要好的吳奚如也同意⁷¹。另外，

66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6-47。

67 同上注，頁47。

68 參王宏志《魯迅、田漢、楊邨人——田漢攻擊魯迅的一篇文章》，《中報月刊》，1986年第6期，1986年6月，頁82-86。

69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7。

70 任白戈《我在「左聯」工作的時候》，《左聯回憶錄》，頁372；魏猛克《回憶左聯》，同上，頁339。

71 吳奚如《我所認識的胡風》，頁237。

胡風自己也說過周揚曾帶他去見魯迅。但另一方面，胡風的回憶錄中也清楚指出他在1932年底回國一行的時候，是見到魯迅跟從前創造社的成員是對立的，這更是反映在馮雪峰與周揚的對立上面。事實上，1932年底「左聯」在跟「自由人」及「第三種人」的論爭中，內部曾有過一些分歧。由於馮雪峰與魯迅等不滿《文學月報》（周揚主編）上一首署名芸生的長詩《漢奸的供狀》，認為有辱罵和恐嚇的成分，不是正確的鬥爭方法，結果，魯迅聽取了馮雪峰的意見，寫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批評了周揚⁷²。魯迅這樣做，是因為周揚除了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了芸生的長詩外，還曾經拒絕馮雪峰以文委書記的身分指示他在下一期的《文學月報》上發表文章，公開糾正錯誤⁷³。所以魯迅才以公開信的形式，攻擊芸生的長詩，同時也就順帶的批評了周揚。不過，這件事對於魯迅與周揚的關係似乎沒有馬上造成嚴重的影響。最少周揚還是表現了對魯迅極大的尊重，除了立刻把魯迅的公開信發表在自己的刊物外，還加上了一條按語，說魯迅的是「尊貴的指示，我們應該很深刻地來理解的。」⁷⁴

不過，在這封公開信發表後三個月左右，魯迅的信卻受到責難。由「左聯」成員祝秀俠主編的《現代文化》，刊登了一篇由首甲（祝秀俠）、方明、郭冰若及丘東平署名的文章，叫《對魯迅先生的〈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有言》，巧擊魯迅「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色彩」、「右傾機會主義的復活」及「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論」等⁷⁵。這是魯迅自1930年加盟左翼陣營後第一次公開的受到左派人士的攻擊，魯迅對此極為不滿。

不過，我們實在沒有證據證明周揚是背後策劃攻擊魯迅的人。但在這篇文章刊出後一年半——這時候魯迅與周揚交惡已是十分明顯的了——魯迅在一封給蕭軍的信中談到這件事，卻似乎是把它和周揚（最少是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扯在一起：

那個雜誌[《文學月報》]的文章，難做得很。我先前也曾從公意做過文章，但同道中人，卻用着假名夾着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⁷⁶

但無論這次事件對魯迅與周揚的關係造成多大的影響，也不應與胡風有甚麼關係。上文說過，在與「自由人」及「第三種人」的論爭中，胡風比較支持周揚一派的激烈看法；而且，首甲等人的文章發表在1933年2月，那時候胡風跟魯迅還沒有見過面，不可能從中挑撥，破

72 《魯迅全集》，卷四，頁451-453。

73 馮夏熊《馮雪峰談左聯》，頁10。

74 《文學月報》，第五、六號合刊，《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卷二，頁5-9。

75 《中國現代文藝思想鬥爭史》，上冊（一），1976年2月，頁262-263。

76 魯迅1935年4月28日給蕭軍信，《魯迅全集》，卷十三，頁119-120。

壞魯迅與周揚的關係。此外，胡風對於聯署攻擊魯迅文章的作者之一丘東平，1932年底回國初次見面時便有很好的印象⁷⁷。同時，他還曾經在發表了攻擊魯迅的文章的《現代文化》上發表過作品⁷⁸。雖然說他那時候不知道祝秀俠等人攻擊魯迅，但最少可以看出，他當時與這班人是十分接近的。

「左聯」中人公開發表文章攻擊魯迅，除了這一次外，現在知道的還有兩次。一是1934年7月3日廖沫沙以林默的筆名在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上撰文攻擊魯迅的一篇文章《倒提》有買辦意識。他自己後來的解釋是他不知道《倒提》是魯迅所寫的，原因是魯迅用了一個較新的筆名「公汗」⁷⁹。魯迅受到另一次攻擊是在同年的8月31日，田漢以紹伯的筆名，在《火炬》上發表《調和——讀〈社會月報〉八月號》，說魯迅善於調和，替公開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及「左聯」的楊邨人「打開場鑼鼓」⁸⁰。這兩次事件對「左聯」的分裂有很大的影響。在《花邊文學》的序言中，魯迅提到了廖沫沙的文章，說是「同一營壘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向他射暗箭⁸¹。對於田漢，魯迅更是憤慨，他甚至公開的作出了詰難：

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⁸²

而差不多就在田漢發表這篇《調和》後不久，魯迅便拒絕在「左聯」裏擔當任何職務⁸³，由此可見這次事件的嚴重性。

不過，就像《現代文化》那次一樣，我們不可能明確肯定周揚與這兩篇攻擊魯迅的文章直接有關。但廖沫沙說過，田漢是他少數最親密的朋友之一⁸⁴；而田漢則與周揚極為接近，魯迅就是把他們認定為一伙，加上夏衍和陽翰笙，合稱之為「四條漢子」。

跟《現代文化》那次事件不同的，是廖沫沙和田漢的文章都是發表在胡風與魯迅成為好朋友以後，大部分人都認為胡風在這時候已開始進行了分裂魯迅和周揚的工作。可是，在這兩次事件中，胡風又能負上甚麼的責任？必須強調的是：這兩次令魯迅大為不滿的事件，起

77 胡風《憶東平》，《胡風文集》，上海：春明書店，1948年1月，頁75。

78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一），頁35。

79 魯迅《倒提（附林默〈論花邊文學〉）》，《魯迅全集》，卷五，頁490-494；廖沫沙《我在三十年代寫的兩篇雜文》，《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2期，1984年5月，頁40-45；參王宏志《花邊文學事件——論廖沫沙攻擊魯迅的一篇雜文》，《中報月刊》，1986年第4期，1986年4月，頁44-47。

80 魯迅《且介亭雜文·附記》，《魯迅全集》，卷六，頁208-211；魯迅《答〈戲〉周刊編者信》，同上，頁147-148。

81 《魯迅全集》，卷五，頁417。

82 魯迅《答〈戲〉周刊編者信》，《魯迅全集》，卷六，頁148。

83 任白戈《我在「左聯」工作的時候》，頁375。

84 廖沫沙《我在三十年代寫的兩篇雜文》，頁41。

因都是別的人先寫了文章攻擊魯迅，這與胡風是否做了分裂的工作無關。即使當時胡風不在魯迅身邊，也許仍然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那麼，又是不是說胡風對於「左聯」的分裂不應負任何的責任？假如真的是這樣，到底是為了甚麼有這麼多人對胡風提出指控，說他破壞了「左聯」的團結？必須指出：這些指控並不是在五十年代胡風受到中共清算批判後才有的，早在三十年代便有人攻擊過他的分裂行為，最著名的自然是徐懋庸在1936年寫給魯迅的信裏面的話，徐懋庸說魯迅一直為胡風招為私有，眩惑羣衆，「於是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又說「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⁸⁵那麼究竟胡風作出了甚麼實際的分裂行動？

上文徵引過任白戈的話，說自1934年開始，胡風一方面在「左聯」的會議上提出了與周揚不同的意見（這本來是沒有甚麼不妥的），另一方面在給魯迅匯報時又經常加入自己的看法。這點很奇怪，究竟任白戈怎麼可以知道胡風向魯迅匯報時說了些甚麼？

不過，話得說回來，從今天所能見到的一些原始資料——主要是現存魯迅給胡風的六封信——我們也的確能夠確定胡風是有向魯迅投訴其他「左聯」成員的。

第一，1935年5月17日，魯迅給胡風的信裏說：

蕭有信來，又催信了，可見「正確」的信，至今沒有發。⁸⁶

據胡風的回憶及對這封信所作的註釋，他在擔任「左聯」書記期間，曾經代表「左聯」寫信向莫斯科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匯報工作，這些信就是通過「左聯」駐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代表蕭三轉交的⁸⁷；魯迅信中所說的「蕭」，指的就是蕭三。在他離開「左聯」後，他的匯報給周揚等批評為「不正確」。但另一方面，周揚又沒有再寫信給蕭三，繼續匯報「左聯」的情況，以致蕭三寫信向魯迅催問。據胡風說，所謂「『正確』的信」，是說「左聯掌權者自命『正確』」，是一種「諷刺」⁸⁸。我們沒有看過胡風的匯報，無從判斷那些信是否「正確」。不過，肯定胡風在先前曾經跟魯迅談過這件事，而裏面也有一定的抱怨，否則不會「諷刺」的說上面那番話。

第二，魯迅1935年8月24日的一封信裏，有這樣的一句話：

至於我們的元帥的「慳吝」說，卻有些可笑，他似乎誤解這局面為我的私產了。⁸⁹

85 徐懋庸1936年8月1日給魯迅信，附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卷六，頁526。

86 《魯迅全集》，卷十三，頁129。

87 胡風《魯迅書信注釋——涉及我和與我有關的情況》，頁74；胡風《關於「左聯」與魯迅關係的若干回憶》，頁179-180。

88 同上注。

89 《魯迅全集》，卷十三，頁194。

這涉及到的是由另一「左聯」盟員徐懋庸所主編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徐懋庸在他的回憶錄裏說：由於他們沒有錢支付《文學生活》的印刷費，曾經向魯迅募捐，但給魯迅兩次拒絕了⁹⁰。從這封信看，這「慳吝」說是胡風告訴魯迅的，因為魯迅這封信是答覆胡風兩天前寫給他的信的（魯迅這封信的開首是「二二日信收到」）。對於魯迅這段話，徐懋庸後來有這樣的看法：

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第一，當時從「左聯」分裂出來的胡風，對於周揚方面的動靜，是十分清楚的。第二，胡風總是把得到的消息報告魯迅，以激起魯迅對「元帥」的憤怒的。第三，周揚身邊，可能是埋伏著胡風的內線，經常向胡風通風報信的。⁹¹

這段分析雖然措詞過於偏激強硬，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此外，在另一封信中（1935年6月28日），魯迅說韓侍桁「會打破人的飯碗」⁹²。這也是涉及胡風的。早些時候，胡風經楊幸之介紹，進入了孫科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當編譯。但後來韓侍桁故意在教育館裏公開了胡風的身分，說他又拿國民黨的錢，又拿共產黨的錢，胡風被迫辭去了教育館的工作⁹³。雖然這件事與「左聯」內部的分裂無關，但也可以證明胡風是經常向魯迅申冤的。

在現存的六封信裏，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幾乎每一封信都有魯迅諷刺或甚至是咒罵周揚（「我們的元帥」、「工頭」）的地方：

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裏坐了。記得托爾斯泰的甚麼小說說過，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險的，但一看見大將面前防彈的鐵板，卻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裏怕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帥以為生命價值，彼此不同，那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被打軍棍。⁹⁴

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

我的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舊很好的），但我相信我是對的。將來通盤籌算起來，一定還是我的計劃成績好。現在元帥和「懺悔者」們的

90 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7月，頁83。

91 同上注。

92 《魯迅全集》，卷十三，頁160。

93 胡風《魯迅書信注釋——涉及我和與我有關的情況》，頁75；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8。

94 魯迅1935年6月28日給胡風信，《魯迅全集》，卷十三，頁160。



聯絡加緊(所以他們的話,在我們裏面有大作用),進攻的陣線正在展開,真不知何時才見晴朗。⁹⁵

這幾段文字固然證明了魯迅與周揚之間的問題很嚴重,但魯迅對著胡風說這些話,也能顯示出胡風的立場。很可能在其他的接觸中,也經常談到類似的話題。這可能就是周揚等人心目中胡風的分裂行爲。

此外,在胡風有關這段時期的回憶文字裏,經常談到他自己任職「左聯」書記時對「左聯」的貢獻,例如上文說過向莫斯科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匯報工作;另外是在「左聯」內組織了三個研究會——小說研究會、理論研究會及詩歌研究會——開展工作;並曾出版內部刊物《文學生活》;更負責每月向魯迅及茅盾收取捐款,擔當魯迅與「左聯」之間的職繫人。可是,他又強調在他辭去「左聯」書記的職務後,這些活動大都停止了⁹⁶。不難想像,胡風在與魯迅的交談中,也會作出同樣的比較,結果自然不免影響了魯迅對周揚等人的評價。

六

胡風自1933年12月開始任職「左聯」的書記,但不及一年的時間,他便辭去了這個重要的職位。從此,他在「左聯」「只是掛一個名,不參加任何組織活動。」⁹⁷這是因為穆木天向周揚等人告密,說胡風是國民黨南京方面的特務。這個問題不單涉及了胡風個人,更大大的影響了魯迅、胡風及周揚等人的關係。

1936年8月,魯迅給徐懋庸寫了一封公開信,痛罵周揚及徐懋庸等人。在這封公開信裏,魯迅還敘述了他與周揚、田漢等的一次見面:

胡風我先前並不熟悉,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凭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爲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⁹⁸

這段文字很重要,「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清算的所謂「四條漢子」就源於此。這四個跟魯迅見面的人,除了田漢和周揚外,還有夏衍和陽翰笙。「文革」期間,雖然胡風一點也沒有受到

95 魯迅1935年9月12日給胡風信,同上注,頁211。

96 胡風《關於「左聯」與魯迅關係的若干回憶》,頁178-179。

97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8。

98 《魯迅全集》,卷六,頁354-535。

厚待，但爲了打擊所謂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四條漢子」與魯迅的會面，也成了他們的重要罪狀之一，有所謂「魯迅怒斥四條漢子」的說法⁹⁹。「四人幫」倒台後，「四條漢子」全部獲得平反。身爲當事人之一的夏衍，在1979年寫了篇引來了很大非議的文章《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這篇文章主要針對馮雪峰在1966年8月10日所寫（1972年12月5日修訂）的一份材料¹⁰⁰；據夏衍說，他的目的是「要把一些尚未澄清的問題說明一下真象」¹⁰¹。文章涉及的問題很多，這裏只就探討跟魯迅和胡風有關的部分。魯迅的公開信《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是夏衍認爲比較重要的資料，但其實他觸及的主要是那次「四條漢子」跟魯迅的見面。可以肯定的說，他是在直接駁斥魯迅的說法。

夏衍首先指出：他們那次與魯迅見面，並不是特別爲了要向魯迅揭發胡風的身分，而是周揚說很久沒有向魯迅匯報工作，所以通過夏衍（魯迅給徐懋庸的公開信所說的「一個名人」指的就是夏衍）跟魯迅「約個時間，向他匯報一下工作，並聽取他的意見。」¹⁰²夏衍還強調，他本來以爲只有周揚、陽翰笙和他自己三個人，但當天田漢也隨周揚來了；他那時候有點感到意外，因爲他早已知道魯迅不大喜歡田漢。夏衍說，開始的時候，陽翰笙向魯迅匯報了「文委」的工作，主要是說他們開始克服了過去狹隘的關門主義。「魯迅聽了，沒有不同意見，而且點頭稱是。」周揚也跟著匯報了「左聯」的情況。就在這時候，田漢突然提出了胡風的問題，他告訴魯迅胡風在政治上有問題，請魯迅當心，這就令氣氛變得很緊張了¹⁰³。

夏衍另一點不同意魯迅的說法的，就是他說這次會面並非「不歡而散」。夏衍指出。儘管田漢提出胡風的問題時，一時搞得很緊張，但陽翰笙馬上巧妙地把話題轉開了，氣氛便緩和起來。他們繼續談了一些別的事情，魯迅還捐了一百元給「左聯」，更笑著說自己願意做一個「捐班作家」。夏衍的結論是：

從總的情況來說，這次談話儘管有一度緊張，但是魯迅總的情緒還是很好的。¹⁰⁴

此外，夏衍還指出魯迅給徐懋庸的公開信中有關這次會面的日期的紀錄是錯的。他說：既然那封公開信寫於1936年8月，信中的「去年的有一天」，就應該是指1935年的秋天。可是，那時候田漢和陽翰笙都已被捕，押在南京，不可能有「四條漢子」去見魯迅的事。他說那次見面是在1934年的秋天，還說魯迅筆下「卻見駛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以及「一律洋

99 參夏衍《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文學評論》，1980年第1期，1980年1月，頁96。

100 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新文學史料》，第二輯，頁247-258。

101 夏衍《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頁92。

102 同上注，頁95。

103 同上注。

104 同上注，頁95-96。

服]都是不準確的。因為他們雖然確是預先僱了一輛「出差汽車」,但由於內山書店(他們見面的地點)附近經常有工部局巡警及國民黨的警探,所以他們不是在內山書店門口下車,而是在別處下車後,分頭步行到內山書店去。他也清楚記得自己不是穿洋服,而是穿一件深灰色駱駝絨袍子¹⁰⁵。

對於同一事件,魯迅與夏衍有不同的說法,孰是孰非,實在不容易確定。不過,夏衍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他自己說得很清楚,那是為了駁斥「『四人幫』捏造的甚麼『魯迅怒斥四條漢子』」的事情¹⁰⁶。既然有這樣的動機,他的論點又是否一定客觀?相反來說,魯迅當時似乎沒有竄改史實的需要,以求達到某一種目的。另外,魯迅這封給徐懋庸的公開信,寫作時間距離這次會面只有一年左右,但夏衍這篇文章卻是寫在1979年5月,也就是差不多四十五年後了。說魯迅全記錯了,而夏衍又全記得了,是不是可以令人信服?而且,夏衍的文章還有很多別的地方明顯是錯了的(例如文中談到馮雪峰自瓦窩堡返回上海的日期等)。對於這點,不少人也寫過文章加以駁斥¹⁰⁷。

一些枝節的問題,如「四條漢子」是否「一律洋服」,是乘車來或是各自步行來等,我們也不必詳細探究。值得比較仔細看看的有兩個問題:一是他們見面的日期;二是胡風究竟與國民黨有甚麼關係?

關於第一個問題,夏衍說這次會面是在1934年秋天,而不可能是1935年秋。原因是那時候田漢和陽翰笙已被捕,押於南京。可是,從給徐懋庸的公開信看,魯迅並沒有說過是在1935年秋天見面的。這封信寫於1936年8月,「去年的有一天」,不一定指1935年8月,1935年裏的任何一天也可以。在這裏,我們可以先徵引大陸學者榮太之在一份內部發行的刊物上的分析,榮文在這問題上很有參考價值。

榮太之指出,他們通知魯迅的事,要有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一)田、陽、周、夏四人都在;(二)穆木天釋放後;(三)魯迅知道穆木天成為「轉向者」。¹⁰⁸

關於穆木天,他是在1934年7月被捕的。魯迅1934年7月30日的日記寫道:「聞木天被擄。」¹⁰⁹8月5日,他在給鄭振鐸的一封信裏說:「穆木天被捕,不知何故,或謂與希圖反日有

105 同上注,頁96。

106 同上注。

107 包子衍《一件早已肯定而又被否定的往事——關於馮雪峰同志一九三六年到達上海的時間問題》,《文學評論》,1980年第4期,1980年7月,頁99-105;榮太之《一些不想說而又不能不說的事——夏衍同志文章讀後》,《魯迅研究動態》,頁4-16。

108 同上注,頁10。

109 《魯迅全集》,卷十五,頁161。

關云。』¹¹⁰不過，還不及兩個月，穆木天獲釋出獄，時間是1934年9月21日。但正如榮太之所說：「即在一九三四年中的三個月裏，我們還沒有材料證明魯迅知道穆木天成爲『轉向者』。』¹¹¹直到1935年1月8日，魯迅在另一封給鄭振鐸的信中，才又提到穆木天：

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與另三人作一獻上之報告，毀左翼惟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兩人，……（穆公們之獻文，是登在秘密刊物裏的，不知怎的爲日本人所得，譯載在《支那研究資料》上了，遂使我們局外人亦得欣賞。……）¹¹²

這裏我們可以補充一點：穆木天宣佈脫離「左聯」的宣言，是在上海的一些報章上刊載過的。1934年9月25日，《大晚報》上發表了《穆木天汪漢雯劉智民脫離左聯意見》；翌日（9月26日），《申報》又發表了《三左聯盟員發表脫離關係宣言》¹¹³。本來，魯迅照理是應該看到這些宣言的，但從上引他給鄭振鐸的信看，他是通過日譯才知道此事的，時間顯然是晚了一點。榮太之就是據此推斷「『通知』魯迅的事，大概也只能在這前後吧。」¹¹⁴

至於田漢和陽翰笙被捕的問題，榮太之指出：他們二人是在1935年2月19日被捕的。那麼，他們四人一起去見魯迅，是不是有可能發生在1935年1、2月間？這仍然符合魯迅所說的「去年的有一天」。

除了榮太之的分析外，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兩點資料。一篇專題探討穆木天在「左聯」的活動的文章，有這樣的記述：

九月，穆木天出獄。由於有特務監視，也爲了不給組織和同志們帶來麻煩，他在這一時期閉門不出，埋頭在翻譯和文稿整理工作，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繫，直至很長時間之後特務監視撤除，穆家又搬到了法租界，他才逐漸恢復參加左翼文化活動。¹¹⁵

既然這樣，穆木天要通知周揚胡風的身分，也必須是在他出獄後一段「很長時間」後才可能的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誰負責約見魯迅的問題。根據魯迅和夏衍的說法，約魯迅見面的是夏衍。這點很特別。衆所周知，在胡風擔任「左聯」書記期間，他完全負起了與魯迅聯繫的責任。夏衍說過，這次會面本來只是一次普通的匯報工作；假如胡風當時還在「左聯」，實在沒有理由不是由他負責匯報，最少也是由他來安排這次見面的吧。由此推想，這次會面很可

110 《魯迅全集》，卷十二，頁501-502。

111 榮太之《一些不想說而又不能不說的事——夏衍同志文章讀後》，頁10。

112 《魯迅全集》，卷十三，頁12。

113 張偉《穆木天》，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聯」作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4月，下卷，頁100。

114 榮太之《一些不想說而又不能不說的事——夏衍同志文章讀後》，頁10。

115 張偉《穆木天》，頁100。

能是在胡風離開「左聯」後的了。夏衍又說過：周揚覺得「好久」沒有向魯迅匯報了，所以才囑夏衍安排這次見面。換言之，這次會面是在胡風離開「左聯」後一段時間才安排的——胡風是在十月左右才辭去「左聯」書記的職位的。

不過，話得說回來，上文的討論只能說魯迅所指這次見面是在1935年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但反過來說，似乎我們也沒有確實的證據，說夏衍認定這次見面的日期是在1934年秋是錯誤的。最少，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1934年秋，魯迅已知道胡風給人說是南京派來的內奸，而這消息的來源就是胡風自己。

根據胡風的回憶錄，他還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時，遇上了韓侍桁。韓除了揭穿胡風的身分外，也提到穆木天被捕後，公安局查問了很多人，卻沒有問及胡風。胡風認為自己的身分敗露了，便辭去文化館的工作，又在沙汀家碰到周揚，報告了韓侍桁的話，並辭去了「左聯」的職務。據胡風說，他辭去「左聯」職務的當時（1934年10月），便馬上把事情告訴了魯迅¹¹⁶。

美國學者安東尼·凱恩(Anthony J. Kane)在他有關「左聯」的博士論文中選用了夏衍的說法，認為這次會面是在1934年秋。跟著他推算出魯迅與胡風的友誼，以及他跟「左聯」的領導層分裂等，都是由於這次會面促成的。他所持的理由是魯迅答徐懋庸的公開信說過：「胡風我先前並不熟悉。」¹¹⁷

關於這一句話，凱恩的理解很特別，以下是他把這句話翻譯成英語後，我又把它譯回中文的樣子：

去年的有一天，在我跟胡風熟悉之前，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¹¹⁸

他這樣去理解魯迅的話，很自然便會把這次見面看成是在胡風跟魯迅已經是好朋友之前發生的。但魯迅的原意又是不是這樣？不能否認，這句話是有點含糊的。但無論如何，上引凱恩的翻譯是不準確的。文中的「先前」，應作「從前」、「最初的時候」等；魯迅把這句話放在「去年的有一天」前面，足見這兩部分的關係並不直接，意思是「我最初跟胡風並不熟悉，去年的有一天，……」

況且，假如那時候魯迅跟胡風還是很生疏，而且還沒有和周揚等人交惡，那麼，有沒有可能魯迅在聽到周揚等提出的警告時，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應？上文已經說過，胡風跟魯迅是在1934年初——最遲是1934年中，已經成為好朋友。同時，魯迅與周揚等人的關係變得越

116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8。

117 Anthony J. Kane, "The League of Left Wing Writers and Chinese Literary Policy"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pp. 219-220.

118 同上注。他的譯文原來是："One day last year, before I knew Hu Feng well, a famous person made a date to talk to me."

來越差，七月有廖沫沙的攻擊，八月有田漢的《調和》，就是爲了這些緣故，魯迅不肯相信周揚等人說胡風是內奸的指控。夏衍還說過，田漢請魯迅當心胡風的時候，氣氛馬上變得很緊張，就是在沒有提出「轉向者」穆木天的名字前，魯迅已經是「很不高興」了¹¹⁹。很明顯，關鍵在他信任胡風，而不完全在他憎厭穆木天。

跟著要討論第二個問題，就是胡風的「內奸」身分問題。

從現在所見的資料看，傳出胡風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的消息的是穆木天。關於這一點，胡風提供了一個解釋。

據胡風說，穆木天原來對他也是表示親密的。但在1933年底或1934年初，聶紺弩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請了一次宴，出席的大都是左翼人士，並每人贈報一份。但請酒送報都沒有穆木天，穆木天遷怒於胡風，認爲是胡風指使聶紺弩這樣做的。他們還曾在一次詩歌研究會上發生口角，胡風推算這是穆木天誣告他的原因¹²⁰。不過，這看來不很合理。「左聯」內部的人事糾紛一向十分複雜，但卻從沒有發生過類似的「誣告」事件。況且，在那次事件中，真正惹起穆木天不滿的是聶紺弩，而不是胡風，爲甚麼穆木天不去誣告聶紺弩？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指控胡風是內奸的「證據」，似乎只有兩點：一是穆木天在公安局受查問時，公安局問及很多人，卻沒有提到胡風；二是胡風在孫科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

關於第一點，主要是見於胡風自己的回憶錄，韓待桁在教育館打破他的飯碗時對他說的¹²¹。這點我們現在是無法判別真偽的，反正公安局有沒有問及某人，也不能說某人就是內奸。但第二點卻很有意思，矛盾在他的回憶錄裏，有一段文字談到這個問題：

「中山文化教育館」是孫科的一個宣傳機構，也是他藉此拉攏人的一個機構，它搜羅一批懂外文的人，翻譯一些國際政治經濟資料，發表在他們辦的刊物上。這些工作很輕鬆，月薪卻高達一百元。但孫科又怕左派人士打進去，故須有人擔保，他才聘用。胡風是通過甚麼關係進去的，我不知道，但他把這件事對我們所有的人都保了密，卻使人懷疑。¹²²

茅盾這段文字帶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究竟胡風通過甚麼關係進入這國民黨辦的機構？二是胡風把任職中山文化教育館的事向「左聯」保密。這二者看來都成了胡風的「罪狀」。關於這兩個問題，胡風晚年在他的回憶錄裏都答覆了。

119 夏衍《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頁95。

120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7-48。

121 同上注，頁48。

122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5月，頁3-4。

根據胡風的回憶錄，孫科成立了中山文化教育館，陳彬和任出版部主任，出版《時事類編》半月刊，譯載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時論。他的秘書楊幸之與胡風的好朋友韓起很熟。通過這個關係，楊幸之把胡風拉進文化教育館當日文翻譯，為每期的《時事類論》譯一兩篇文章，工資一百元，只上半天班¹²³。從這段回憶看，胡風進入中小文化教育館工作，並沒有通過甚麼秘密或是與國民黨有關的關係，韓起是「左聯」成員，甚至陳彬和也是「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的成員。

至於茅盾指胡風把這份工作向「左聯」其他成員保密，為公平起見，我們也應看看胡風自己的說法。在回憶錄裏，胡風清楚的說過，在楊幸之拉他進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時：

我在[[左聯]]書記處報告了這種情況，茅盾，周揚他們都主張我去。¹²⁴

這就是說他並沒有向「左聯」的領導層保密。此外，當時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另一位「左聯」盟員吳奚如，也曾在一篇回憶胡風的文章裏說過：胡風進入文化教育館當編譯，事先是得到「左聯」黨團批准的¹²⁵。這都與茅盾回憶錄的記載不相符。

其實，進入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的途徑和關係，以及是否向「左聯」保密，都不是最嚴重的問題，問題在於究竟在教育館裏做了些甚麼。事實上，當時在中山文化教育館裏與胡風共事的，如張仲實、潘蕙田、沈茲九及陸文路等，都是共產黨員，甚至在文化教育館裏佔較高職位的左恭，當時也是中共地下黨員¹²⁶。難道他們全都是國民黨的特務？胡風方面，他的譯文主要發表在《時事類編》的「學術論著」欄內；很多時候，他有自己選擇文章翻譯的權利，他也就盡可能選一些左傾的文章。例如他曾翻譯過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宮本顯治的文章，還有大森義太郎的《現代知識階級底困惑》，佐野架娑的《作為農民戰爭的太平天國革命》等。另外還有一篇蘇聯短篇小說《勒覺爾金》¹²⁷。這些都是對「左聯」的工作有利的。因此，我們不能說他進入了國民黨的機構工作，就一定是南京派來的特務。況且，胡風進入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時是1933年10月、11月間，這時候胡風與周揚等人的關係還很好，一直以來沒有人提出甚麼意見。只是在1934年秋，胡風與他們意見不合鬧翻後，便不斷出現有關他是內奸的傳言，這能不令人懷疑是與人事糾紛有關的嗎？

茅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胡風的問題時，大惑不解的說：「胡風何以有這樣的魅力，竟使

123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5。

124 同上注。

125 《我所認識的胡風》，頁241。

126 《回憶參加左聯前後》(二)，頁45-46。

127 徐霖恩《胡風》，《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聯」作家》，下卷，頁132。

魯迅聽不進一句講胡風可疑的話？」¹²⁸我們先暫且不論胡風的「魅力」，但反過來看，究竟「四條漢子」能夠提出些甚麼證據去說服魯迅？

從魯迅給徐懋庸的公開信以及夏衍的回憶看，在那次「四條漢子」與魯迅的會面中，他們都只是說消息來自穆木天。這樣的一面之詞，而且是來自一個剛登報宣佈脫離「左聯」的人口中，魯迅不接受是絕對正確的。這與胡風的「魅力」無關。夏衍在《一些早該忘卻而又未能忘卻的往事》一文中，曾說過他們的消息來源不只是穆木天一人，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李少石，曾跟他說過要留意胡風；此外，夏衍還指出，鄭振鐸曾經告訴他：開明書店的董事長，以及國民黨的要員邵力子，曾親口對鄭振鐸及陳望道說過，胡風與南京是有關係的¹²⁹。這似乎是拿出了一些比較權威的「證據」來。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為甚麼夏衍不在跟魯迅會面的時候提出這些證據來？陳望道和鄭振鐸都是魯迅的好朋友，把他們的名字說出來，總比說穆木天好得多。此外，陳望道和鄭振鐸如果真的知道胡風有問題，為甚麼他們不直接跟魯迅說？而且，說來說去，夏衍也只能說胡風與南京有關係，究竟是甚麼關係？做過些甚麼？除了在中山文化教育館當編譯外，也再沒有甚麼「罪證」了。

跟著要討論的是胡風的「魅力」，也就是說，為甚麼魯迅會這麼信任胡風？其實，胡風是有他的缺點的，魯迅也曾公開的說出來：

胡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¹³⁰

吳奚如也說他「做人上有缺點和偏激」¹³¹，支持周揚的郭沫若更說胡風「似乎是很聰明而又有些霸氣的。」¹³²但這些小缺點，似乎無損於魯迅對他的欣賞。自然，魯迅信任胡風，很可能有人事上的原因。上文說過，馮雪峰起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在魯迅方面來說，胡風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努力工作。

胡風回國後，不久便加入「左聯」的領導階層，而且馬上開展了工作。他擔任「左聯」的宣傳部長時，在宣傳部下設了三個研究會，又組織討論會。此外，他主編出版了一份油印刊物《文學生活》，並不停的寫文章，並參加1934年「左聯」關於利用舊形式及大眾語問題的討論。1934年底出版短詩集《野花與箭》。離開中山文化教育館後，他便以寫文章作為職業，寫了幾篇很受好評的評論文字，如《張天翼論》、《林語堂論》等；又從日文翻譯介紹了一些台灣和朝

128 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實》，頁245。

129 夏衍《一些早該忘卻而又未能忘卻的往事》，頁96-97。

130 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卷六，頁535。

131 吳奚如《我所認識的胡風》，頁241。

132 郭沫若《蒐苗的檢閱》，《文學界》，一卷四號，1936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3月，頁712。

鮮的作家，如陸達的《送報夫》、呂澂若的《牛車》等。此外，他又和魯迅及蕭紺弩合編了《海燕》。他也是《作家》的編委之一；另外又編了《木屑文叢》；1936年，他還一口氣的出版了兩本書——《文藝筆談》和《文學與生活》。這都是魯迅所欣賞的。相反來說，魯迅對於「左聯」中不願意從事寫作的領導人物，就經常表現了不滿¹³³。

其實，說胡風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可以說是很大的諷刺。就現在所見的資料，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身為作家的胡風，實在也確是擔當過特務的工作——為中共作特務。在這方面提供了最多材料的，是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吳奚如。

吳奚如是在1933年春加入「左聯」的；那年夏天，胡風被日本驅逐回國，吳奚如負責代表「左聯」到上海外灘去迎接，認識了胡風。後來，接觸的機會多了，二人很快便「形成了戰友的情誼。」¹³⁴到了冬天，吳奚如轉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中共中央指派吳奚如在上海左翼文化圈中物色一批人到特科工作，他們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一、忠實可靠，二、在國民黨上層份子中有親友關係；三、有獨立工作能力。¹³⁵

據吳奚如說，胡風是他物色的對象之一。雖然胡風自己婉拒了這份工作，但由此可以證明，胡風具備了以上的三個條件。三個條件中，以第一個最為重要。中共特科的工作是絕對機密的，吳奚如願意把胡風選進去，顯然是對他有很大的信心。吳奚如說過：「根據種種客觀事實，我當時判斷胡風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¹³⁶

此外，從1935年起，吳奚如還被中共委派為魯迅與中共之間的聯繫人。但一方面是為了魯迅的安全，另一方面由於吳奚如的身分必須絕對保密，所以他並不直接與魯迅接觸，「而是通過雙方都在政治上予以信任的人——胡風從中傳遞。」¹³⁷結果，胡風就成了中共的「機要交通員」。而且，這重要的任務並沒有因為胡風受到穆木天及周揚等人的指控而受到影響。他一直負責這項工作，直至1936年4月底才停止。那時候馮雪峰自陝北返回上海，馮雪峰可以代表中共中央直接與魯迅聯繫，無須再經中間人傳遞信件。

吳奚如的描述不斷強調胡風的任務是十分機密的。這樣，周揚等「四條漢子」是不可能知道了的。但魯迅是知道的，他還透過胡風為中共特科做了一連串可以算是「特務」的工作。正因為這個緣故，他對胡風有很大的信心，同時又不肯相信周揚等人的指控。

究竟胡風為中共特科做了些甚麼？吳奚如比較詳細的報導了兩件事：

133 徐懋庸《我和左聯魯迅周揚的關係的始終》，《魯迅研究參考資料》，上海：上海師範大學，1977年10月，頁49-50。

134 吳奚如《我所認識的胡風》，頁236。

135 同上注，頁241。

136 同上注。

137 吳奚如《回憶偉大導師魯迅》，《魯迅研究資料》，第五輯，1980年5月，頁186。

第一是為被囚於南京的方志敏傳遞書信及作品。方志敏是中共中央委員，又是閩浙贛工農民主政府主席及紅十軍的政治委員。1934年任中共抗日先遣隊總司令，1935年1月被捕。他在獄中以隱形墨水寫了給中共黨中央的報告以及一封致魯迅的信，輾轉送到上海內山書店，再轉給魯迅，魯迅把這些一個字也沒有的白紙交給胡風研究，胡風求助於吳奚如，用碘酒擦過後，出現了字迹，於是中共才與方志敏接上了聯繫。雖然他們沒有把方志敏營救出來，但卻因為這次聯繫成功，方志敏能夠繼續把在獄中寫成的作品，包括《可愛的中國》及《潰貧》等傳出來¹³⁸。在這次事件中，胡風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件涉及胡風和魯迅的機密工作，是在1935年秋，國民黨政府在上海破獲了共產國際的一個情報組，原來跟吳奚如聯絡的交通員也沒有依時接上。吳認為日本情報系統已掌握了線索，於是找魯迅，請他通過日本的朋友查探。三天後，吳奚如便收到經胡風轉來魯迅所查得的情報¹³⁹。

從以上簡略的描述，我們可以肯定胡風的確擔任過特務的工作。不過，跟穆木天和「四條漢子」所提的版本不同之處，在於他是在上海為中共當特務，上述兩件事其實都是相當危險的，同時還涉及了中共以至共產國際一些重要人物的安危。作為中共特科工作人員的吳奚如，把這些重要任務交給胡風，可見他確是認為胡風是可堪信任的。此外，這些事很快得到解決，沒有出甚麼岔子，也證明了胡風是可靠的。另一方面，在這兩件事中，魯迅也可算是當事人，胡風的表現。他是完全看到和清楚的。既然這樣，他又怎會相信胡風是南京方面派來的內奸？

七

跟著要討論的是「兩個口號」論爭。

所謂「兩個口號」論爭，是指在1936年中上海左翼作家內部爆發的一場論爭。第一個口號是周揚等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另一個口號則是由胡風在1936年6月發表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甚麼？》一文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¹⁴⁰。由於篇幅以及重點不同的關係，這裏不詳細討論這「兩個口號」的內容以及論爭的經過，只集中討論胡風在這場論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場論爭對他和魯迅、周揚等人的關係的影響¹⁴¹。

138 吳奚如《魯迅先生和黨的關係》，《魯迅研究資料》，第四輯，1980年1月，頁190-192；吳奚如《答問和訂正》，《魯迅研究動態》，第二十一期，1983年1月，頁1-3。

139 同上注，頁3；吳奚如《回憶偉大導師魯迅》，頁188-190。

140 胡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甚麼？》，《文學叢報》，第三期，1936年6月，《「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頁214-216。

141 關於「兩個口號」論爭，參王宏志《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及兩個口號論爭》，《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第二卷，1987年，頁225-246。

1935年底，周揚為響應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在上海文化界展開了統戰工作。除了解散「左聯」外，還推出「國防文學」口號，以及籌組一個較廣泛的統一戰線文藝團體。但魯迅和胡風都拒絕參加，對「國防文學」口號也採取漠視的態度。這惹來了一些人很大的不滿，認為是宗派主義的行為，對文藝上的統一戰線起了阻礙的作用¹⁴²。事實上，許多人都由於魯迅的緣故，對周揚所組織的新團體，採取了觀望的態度¹⁴³。

1936年4月25日，馮雪峰自瓦塞堡返抵上海，肩負了中共的秘密任務。回到上海後，他馬上與魯迅聯絡，並在他家住上了兩個多星期，然後才搬往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家住。他與胡風見面的一天，是他回到上海後的第三天。胡風到魯迅家找他（胡風是從內山書店知道馮雪峰回來的消息的），就是在這一次的見面裏，他們議定了新的口號¹⁴⁴。

儘管一些細節不盡相同，但胡風和馮雪峰的回憶錄都同樣說新口號的底稿是胡風提出的。馮雪峰說：胡風想起了1933年「左聯」提出過的「民族革命戰爭文學」口號，馮雪峰自己加上「大眾文學」四個字¹⁴⁵。胡風則回憶說他是先提出「民族解放戰爭的人民文學」，馮雪峰修改成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¹⁴⁶。不過，兩人的回憶錄都清楚的說明是馮雪峰先建議要另外提出一個新口號的。換言之，胡風是在馮雪峰的提示下提出新口號的，胡風的回憶錄裏甚至說過：「口號是他要提的（具體文字還是採用了他的）。」¹⁴⁷這就把他應負的責任減低了。

除此之外，魯迅也願意為胡風承擔部分的責任。本來，制定新口號的時候，魯迅是不在場的，但他們後來徵得魯迅的同意，馮雪峰說：「這口號的最後的決定者是魯迅，也就是說，這口號是魯迅提出來的。」¹⁴⁸後來，魯迅在給徐懋庸的公開信裏也說：

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¹⁴⁹

142 例如何家槐曾經批評說：「一般青年作家都表示極熱心；但是有批作家——特別是資格較老的作家們——卻冷淡得很，漠不關心的樣子。」（何家槐等《國防文學問題——〈文學青年〉文藝座談第一回》，《文學青年》，創刊號，1936年4月，《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頁118）；周揚更說：「……一部分[左]的宗派主義者，他們對於國防文學雖然到現在還是保持著超然的沉默的態度，但是他們的宗派主義對於文藝上的統一戰線或多或少地發生了阻礙的力量。」（周揚《關於國防文學——略評徐行先生的國防文學反對論》，《文學界》，創刊號，1936年6月，頁231。）

143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頁320。

144 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頁251。

145 同上注。

146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四），《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1期，1985年2月，頁45-46。

147 同上注，頁50。

148 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頁251。

149 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卷六，頁532。

這大大的減輕了胡風所受的壓力。不過，問題的關鍵還是在胡風寫的那篇文章。關於撰寫這篇文章的過程，幾個當事人有幾種不同的說法。自然，胡風的回憶對他自己是最為有利的。

胡風說：5月7日，他跟馮雪峰議定好了新口號後便離開，由馮雪峰去徵求魯迅的意見。8日上午，馮雪峰告訴他，魯迅同意了這口號，並「要我[胡風]寫文章反映出去」。胡風當晚便寫成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甚麼？》，第二天早上交給了馮雪峰。再過一天的上午，馮雪峰把文稿交還他，「一字不改，說周先生[魯迅]也看過了，認為可以，要我找個地方發表出去。」¹⁵⁰

馮雪峰的說法有點不同。他說是在他回上海後的第三天與胡風見面，並決定提出新口號，同時二人馬上徵得魯迅的同意。「胡風臨走時就說，他去寫一篇文章提出去，魯迅表示同意，我也同意。」¹⁵¹

茅盾的說法對胡風最為不利。在他的回憶錄中，茅盾指出，在一次見面中，魯迅向他說他們已決定並準備推出一個新的口號，以補救「國防文學」口號的缺點。茅盾同意了，但他兩次請魯迅親自寫文章介紹新口號：「這件工作，別人做是不行的，非得大先生[魯迅]親自來做。」魯迅也同意了。但後來，他看到胡風發表文章提出新口號，於是便馬上去找魯迅。魯迅告訴他是胡風自告奮勇要寫這篇文章，但胡風寫完後並沒有給他看過就登出來了¹⁵²。

這裏的分歧就是：究竟是胡風自己要求寫文章的，還是魯迅叫他寫的？另外，胡風把文章寫完後，究竟有沒有先給魯迅和馮雪峰看過才發表？事實的真相是怎樣？這是不容易確定的。毫無疑問，胡風絕對有理由掩飾真相，說一些對自己更為有利的話；另一方面，茅盾對胡風毫無好感，很多時候他談到胡風都用一種極不友善的態度¹⁵³。這樣，他的說法也不一定是可靠的。馮雪峰看來是可以比較客觀的，可是在他去世之前，胡風還沒有得到平反，他是否能夠暢所欲言，也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是胡風自告奮勇要寫的，還是魯迅要他寫的這一點，現在是沒法證實了。不過這也不大重要，反正文章已經寫成了。但第二個問題卻較為重要，因為這可以證明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甚麼？》一文所引起的問題，究竟應該由胡風負責，還是應該由魯迅和馮雪峰來承擔？

從現在所能見到的資料推測，似乎胡風的文章沒有給魯迅和馮雪峰看過就發表出去的可能性較高。主要的證據有二：一是魯迅及馮雪峰事後都說過這篇文章寫得不好，內容有問題，例如上面引過魯迅給徐懋庸的公開信裏便有「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一句；馮雪峰也說過：他當時覺得胡風的態度和活動，是很妨礙團結的¹⁵⁴。這也是批判了胡風的。

150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四)，頁46。

151 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頁252。

152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頁321-322。

153 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實》，頁244-245。

154 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頁253。

如果胡風完全遵從了他們的意見寫文章，發表前又徵得他們的同意，相信不應該有這情形出現吧。證據之二，就是魯迅和馮雪峰制止胡風再寫文章談「兩個口號」的問題。本來，以胡風的性格，面對大規模的批評，是斷不會不反擊的，但是他聽從了魯迅和馮雪峰的指示。馮雪峰說過，由於他覺得胡風第一篇文章有問題，妨礙團結，所以就要胡風不要再寫文章¹⁵⁵。胡風在他的回憶錄裏也說過：本來他覺得是有責任再作一些解釋，並且著手寫好了回答，但馮雪峰制止了他，「說沉默有時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調整處理。」¹⁵⁶吳奚如形容胡風當時是「有點兒憤慨」的¹⁵⁷。

那麼，究竟胡風這篇文章出了些甚麼錯？為甚麼連馮雪峰和魯迅也說這篇文章寫得不好？歸納來說，批評胡風的人一般都說這篇文章犯了兩個毛病：一是不說明這口號是由魯迅提出的，給人一種感覺就是胡風獨斷獨行的把新口號提出來；二是文章裏沒有提到當時已討論得很熱烈、以及普遍受到認同的「國防文學」口號，甚至連當時共產國際及中共（主要是在莫斯科的王明）所提出的新統一戰線政策，文章裏也沒有片言隻語觸及。

對於這兩個指控，胡風實在也無法辯解，事實上，他就是沒有提到魯迅的名字，也沒有提到「國防文學」口號及統一戰線政策。但問題是：是否一定要提魯迅、提「國防文學」口號？自然，不提魯迅，就是使人覺得新口號是胡風提出的，這無疑是令這次「兩個口號」論爭變得劇烈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幾十年後，周揚在接受訪問時便說過：「因為是胡風提的，所以要跟他爭論。」¹⁵⁸為甚麼會這樣？周揚解釋道：

胡風原來是「左聯」的一個領導成員，不過他不是共產黨員，我們對他早有懷疑。當時他在我們地下黨和魯迅中間確實做了很多挑撥的工作，所以他的文章一發表，地下黨員一些搞文藝工作的同志很不滿意。……我們覺得我們提出國防文學，他又另外再提出一口號，就分散了力量，所以就跟胡風展開論戰。大家本來對他就有意見，這裏面當然也有宗派情緒，因為那時候還不能斷定他的各方面，對他個人的歷史還有很多疑問。¹⁵⁹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見到周揚在批評胡風另提新口號的時候，並不是從口號本身著眼，而是從個人方面入手。這是一種強烈的宗派主義態度，是不客觀的。因此，責任不是在胡風，即使他沒有寫文章，別人仍然會在別的事情上針對他。此外，即使說明了魯迅是新口號的策劃

155 同上注。

156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四)，頁46。

157 吳奚如《回憶偉大導師魯迅》，頁191。

158 趙浩生《周揚笑談歷史功過》，《新文學史料》，第二輯，頁234。

159 同上注。

人之一，也不能保證新口號不受到衝擊。上引周揚的談話顯示，只要有人在「國防文學」口號以外另提一個口號，那就是分散力量，破壞統一戰線。魯迅的威信自然很大，吳奚如在一篇文章裏敘述了一次由前「左聯」成員召開的會議。在會議上，馮雪峰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是他提出的。這時候，「周揚立即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我還以為是魯迅提出來的，反對時有所顧慮，現在既知是你提出來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¹⁶⁰這顯示了魯迅對周揚等人確是有一點制衡的作用。但這權威並不是絕對的，徐懋庸就曾公開表示過對魯迅的觀點有意見¹⁶¹，馮雪峰還報導過當時文藝界一些人對魯迅的「誣蔑」：

在這五、六月間，誣蔑魯迅「反對統一戰線」的流言蜚語卻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盛起來，甚至把魯迅同托派相提並論。這些流言都是從文藝界散布出來的，在公開的論爭文章中則用「左的宗派主義」、「不理解基本政策」等詞句和暗示的方法指責魯迅。在「文藝家協會」會議上，竟有公開指責魯迅「阻礙統一戰線」的言論。公開文章上許多反對胡風的話，實際上也有不少是針對魯迅的。¹⁶²

由此可見，胡風在文章中提不提魯迅的名字分別也是不大的。不過，總的來說，究竟胡風為甚麼不提魯迅的名字？這其中確有可能是有強烈的個人主義成分在內的。

至於胡風不提「國防文學」口號及統一戰線，這點責任是較大的。第一篇出來駁斥胡風新口號的文章，由徐懋庸的同一題目寫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甚麼？」》，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徐懋庸質問道：是不是胡風認為「國防文學」口號有缺點，所以才提出新口號來？假如真的是這樣，胡風便應該提出來批評，「不予批評而另提關於同一運動的新口號，這在胡風先生，是不是故意標新立異，要混淆大眾的視聽，分化整個文藝運動的路線呢？」¹⁶³

事實上，魯迅與馮雪峰等認為胡風的文章有不妥當、解釋得不清楚的地方，也應該是指這一點。這從由馮雪峰執筆，以魯迅名義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論現在我們的文藝運動——病中答訪問者》是魯迅第一篇公開討論「兩個口號」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很長，但裏面特別強調的是他擁護全民一致抗日的立場。魯迅說得很明白：「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而他提出新口號，就是要「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¹⁶⁴他更解釋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與「國防文學」口號的關係：

160 吳奚如《我所認識的胡風》，頁243。

161 徐懋庸《理論以外的事實——致耳耶先生的公開信》，《光明》，一卷四號，1936年7月，《「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頁463。

162 馮雪峰《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頁252。

163 徐懋庸《「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甚麼？」》，《光明》，創刊號，1936年6月，《「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頁277。

164 魯迅《論現在我們的文藝運動——病中答訪問者》，《魯迅全集》，卷六，頁590。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吧。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學」……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而且是有益的，需要的。¹⁶⁵

這裏沒有批評「國防文學」口號的缺點，而是把它放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總口號之下，作為一個具體的口號。這點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一文中也重覆了。魯迅強調了新口號比「國防文學」口號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但也承認「國防文學」口號「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所以「這兩個口號應當並存。」¹⁶⁶由此可見，魯迅的態度是極其鮮明的。可是，胡風在提出新口號的文章中，就完全沒有談到這一點。

對於這個問題，胡風在回憶錄中也解釋過了：

徐懋庸責問我在文章裏為甚麼不提到「國防文學」口號。現在茅盾在《回憶》裏也同樣這樣問。我該怎樣提到它呢？它提出的時候，我就思想不通，黨的負責人向我指明了它不妥當，才要再提一個。我能夠說出擁護它的理由麼？或者，我能夠說出批判它的意思麼？不提到它，留待在實踐中去解決，或者不解決（不用權力地位作出硬性結論），為了尊重口號制定者的權威地位，這是在思想問題上可採取的唯一辦法。¹⁶⁷

究竟這個解釋是否可以接受，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嚴格來說，在「兩個口號」論爭中，胡風唯一做了的是把第二個口號提出來。他沒有提到「國防文學」口號，實際上也就是沒有攻擊過「國防文學」。但卻掀起了這場大風波，惹來這麼多的攻擊，這點是魯迅和胡風都始料不及的¹⁶⁸。

上文討論了魯迅和他的「大弟子」胡風的交往，以及他們在上海左翼文藝界所引起的問題和影響。儘管這些問題和影響都很大，但他們實際交往的時間只有三年左右，這也就是魯迅生命的最後三年。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逝世。胡風很早便得到內山書店店員的通知，趕到魯迅家，並參加了籌辦喪事的工作。魯迅下葬前，他還和蕭軍有過一些爭執。有人說是因為他們爭抬魯迅靈柩而打架，胡風則說是有人要求他講話，「替魯迅最後一兩年

165 同上注，頁590-591。

166 同上注，頁533。

167 胡風《回憶參加左聯前後》（四），頁50。

168 同上注，頁46；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卷六，頁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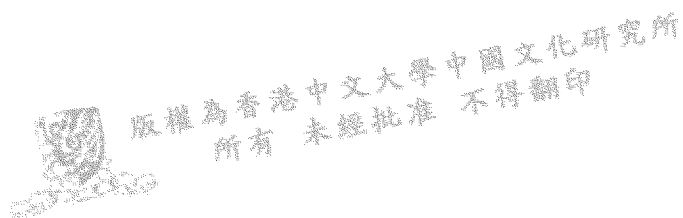
受的攻擊出出氣」,但他拒絕了,因而發生爭執¹⁶⁹。此外,胡風還參加了《魯迅先生紀念集》的編輯工作,還幫助鹿地亘、內山完造及佐藤春夫等翻譯出版日文的《大魯迅全集》。

1981年,胡風平反後不久,寫了一篇《向朋友們,讀者們致意》的文章。胡風說:

三十年代,我曾幸運的工作在[魯迅]先生旁,親聆過先生的教誨,感受過先生的堅深博大的胸懷。¹⁷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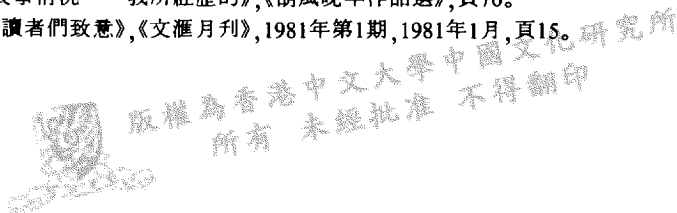
這是胡風的由衷之言。毫無疑問,在魯迅的晚年,胡風是他身邊最親密的弟子和戰友。

1989年7月



169 胡風《關於魯迅喪事情況——我所經歷的》,《胡風晚年作品選》,頁76。

170 胡風《向朋友們,讀者們致意》,《文匯月刊》,1981年第1期,1981年1月,頁15。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Lu Xun and Hu Feng


(A Summary)

Wang-chi Wong

Hu Feng was among the first victims in the Communists' attempt to tighten control over literatur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rule in China. Being labelled the ringleader of an anti-Party and anti-revolutionary clique, he was arrested in May 1955 and imprisoned for twenty-five years. It was not until three years after his death that a rehabilitation satisfactory to his family was announc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Many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on the "Hu Feng case" of 1955 and most agree that the purge on Hu was a consequence of his opposition to Mao Zedong's ideas on literature. While this is certainly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the fact that in the thirties there had been direct confrontation between Hu and Zhou Yang, the man assigned by Mao to take charge of literary affairs after 1949,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Zhou, who was then already heading the left-wing literary circles, had differences with Hu Feng in a number of issues, mostly centered around Lu Xun, "the sage of modern China".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to look carefull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nd Hu Feng, his "senior disciple". It attempts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friendship, to ferret out the reasons why Hu was able to win the absolute confidence of Lu Xun, and to determine how their friendship af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nd Zhou Yang, as well as that between Hu Feng and Zhou Yang. Such important issues as the internal strife of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in its latter stages (1933-36), its dissolution and the subsequent polemic after the dissolution, the so-called "Two Slogan Polemic", are studied in great detail. In short, the paper i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Hu Feng in respect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Lu Xun, a first step in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whole Hu Feng case.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